

# 论罗森伯格对后现象学技术政治理论的探索

李沛源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3月31日

## 摘要

本文旨在系统阐释罗伯特·罗森伯格对后现象学的政治理论化探索。面对后现象学因缺乏规范性维度而遭受“政治哲学维度缺失”的批评, 罗森伯格通过“内外兼修”的路径推动其转型: 在内部, 他将“技术调节”、“技术多元稳定性”及“技术习惯化”等核心概念政治化; 在外部, 他联合芬伯格的批判建构主义、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女性主义立场论, 为后现象学注入规范性基础与权力分析视野。由此, 他构建了以“技术物作为政治斗争场域”为核心的微观技术政治分析框架, 并创制了“变更交叉检验法”这一批判性方法论。尽管该思想在规范性融贯性及微观-宏观衔接上存在局限, 但它为后现象学介入现实政治批判提供了可行性的方案。

## 关键词

后现象学, 技术政治理论, 罗森伯格, 技术多元稳定性, 变更交叉检验法

## On Robert Rosenberger's Exploration of Postphenomenological Techno-Political Theory

Peiyuan Li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rch 2, 2026; accepted: March 21,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Robert Rosenberger's political-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postphenomenology. Confronting the critique of postphenomenology's "political deficit" due to its lack of a normative dimension, Rosenberger promotes its transformation through a dual strategy of internal refinement and external alliance: internally, he politicizes core concepts such as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multistability of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ical habituation”; externally, he integrates Andrew Feenberg’s critical constructivism, Bruno Latour’s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thereby infusing postphenomenology with a normative foundation and a power-analytical perspective. In doing so, he constructs a micro-techno-poli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the idea of “technological artifacts as sites of political struggle,” and creates the critical methodology of “variational cross-examination.” Although this theoretical approach has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normative coherence and the linkage between micro- and macro-levels of analysis, it provides a feasible pathway for postphenomenology to engage in real-world political critique.

## Keywords

Postphenomenology, Techno-Political Theory, Robert Rosenberger, Multistability of Technology, Variational Cross-Exami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自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以来，后现象学以其对“人-技术-世界”关系的精细描述，成为重要理论范式。它将技术理解为调节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媒介，驳斥了技术工具论与实体论，在阐释技术如何塑造知觉、行动与道德体验方面成果显著。

然而，后现象学过度聚焦技术调节的“如何”，相对忽视其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与规范性维度，在面对技术政治、伦理等核心议题时解释力不足。这一局限被学者们概括为后现象学在“政治哲学维度上的缺失”，即其分析往往悬置价值判断，缺乏对社会政治语境的充分考量，存在默认既定权力关系的潜在保守倾向。这引发了一个根本理论困境：描述性的后现象学能否及如何发展为具有现实批判力与社会变革指向的技术政治理论？

美国技术哲学家罗伯特·罗森伯格的思想探索正是对这一困境的集中回应。罗森伯格洞察到，后现象学对情境性、反本质主义与实践导向的承诺，恰恰为其政治理论化提供了潜能。其工作核心在于探索一条使后现象学“政治化”的可行路径，即通过对外部批判理论资源的策略性联合与对内部核心概念及方法论的创造性改造，系统构建一套微观技术政治分析框架，并发展出“变更交叉检验法”这一可操作的批判方法论。国内学者如刘永谋、谭泰成[1]；李三虎[2]等已经注意到罗森伯格对后现象学技术政治理论的探索过程，但都并没有系统阐述罗森伯格探索的完整过程。

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罗森伯格如何通过对其后现象学的政治理论化探索，使其走向一种有效的技术政治理论？其理论的内在逻辑、核心命题与方法论创新是什么？本文首先将剖析后现象学“政治哲学维度缺失”的根源与罗森伯格理论改造的双重动因，继而阐述其“内外兼修”的改造策略，接着系统分析其构建的核心理论框架与方法论，最后评价其学术贡献及理论局限。

## 2. 为何探索：双重动因与理论革新的必然性

### 2.1. 现实动因：敌意设计与微观技术政治的紧迫性

罗森伯格的理论思考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其集中体现在敌意设计这一全球都市空间中普遍存在

的现象。敌意设计指的是通过精心设计公共空间中的技术物与建筑元素(如长椅、屋檐、花坛、地面纹理),以物理方式阻止或阻碍某些被视为“不受欢迎”的行为(如躺卧、滑板、乞讨、露宿)的设计策略。其实例不胜枚举:伦敦 Camden 镇那布满棱角、无法躺卧的混凝土长椅;美国许多城市公园中装有间隔扶手的座椅;商业建筑屋檐下防止鸟类(隐喻性地指向人群)栖息的尖刺;立交桥下为驱离无家可归者而浇筑的水泥锥体;乃至公共垃圾桶的特殊开口设计,旨在阻止拾荒者翻找。

敌意设计的政治性在于其运作机制的隐蔽性、物质性与去主体化。它通常不依赖于明确的法令告示或警察的在场强制,而是将社会控制与排斥的意图直接铭刻在物质形态之中。权力通过物的中介,以非话语、非表征的方式,直接作用于身体,规训行为,分配空间权利。这种“通过设计的管理”对传统政治理论构成了深刻挑战:它表明,政治权力不仅存在于国家机构、法律条文和意识形态宣传中,更弥散于、物化于我们每日生活于其中的、看似中性的技术-物质环境里。它迫使哲学追问:一把长椅如何超越了其作为休闲设施的惯常功能,成为了执行社会排斥的政治行动者?这种物的政治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如无家可归者问题)相关联?

对于擅长分析具体技术物如何调节人类经验的后现象学而言,敌意设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的经验场域。它要求后现象学不能止步于描述长椅如何调节坐姿体验,而必须深入剖析这种调节背后所承载的权力关系、价值冲突与社会后果。然而,经典的后现象学工具箱在面对这一要求时,却显得力不从心,这直接引向了第二个动因——后现象学内部政治哲学维度缺失。

## 2.2. 理论动因：后现象学的“政治哲学维度缺失”及其内在潜能

后现象学自诞生以来,其“政治哲学维度的缺失”便成为学界持续批评的焦点[3][4]。这一缺陷并非指其完全无视政治,而是指其在将技术经验描述与政治权力分析进行系统性、规范性整合方面存在结构性不足。具体而言,其“政治哲学维度的缺失”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对社会历史语境的相对忽视。经典后现象学分析往往聚焦于“人-技术-世界”的意向性关系三角,精于描述技术如何调节个体或小群体的知觉、认知与行动(如显微镜如何扩展视觉,手机如何改变注意力)。然而,这种分析常常相对忽略了该技术得以被发明、设计、生产、推广、接受和使用的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脉络、经济动力、政治决策与文化价值冲突。技术仿佛是从社会真空中浮现,其调节效应似乎仅关乎个体与世界的意向性关系,而与资本、阶级、种族、性别等宏观权力结构无涉。如 Wessel Reijers 和 Mark Coeckelbergh 认为,后现象学缺乏对社会政治层面的关注[5]。这使得其分析在解释像敌意设计这样明显由特定社会议程驱动的现象时,显得片面和缺乏深度。

其二,规范性维度的匮乏与潜在保守性:受现象学描述传统影响,后现象学倾向于采取一种“价值中立”的描述姿态,致力于描述技术调节的经验结构,而对这种调节的伦理正当性、政治公正性等规范性问题,缺乏内在的、系统的批判框架和评价标准。如 Lemmens 认为后现象学主张对具体技术做经验分析却完全忽视技术运作及使用的社会背景是不现实的,他指出“关于资本主义,后现象学保持了彻底的沉默”[6]这种悬置价值判断的倾向,可能导致其分析默认了技术所嵌入的既定社会秩序与权力关系,从而带有潜在的保守主义色彩。

其三,能动性分析的微观局限。后现象学强调人与技术的“相互构成”,打破了主客二元论,这是一大贡献。但在分析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时,其对人类集体能动性(如社会运动、制度设计者、资本力量)与非人行动者(技术物)之间复杂的权力互动,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如何通过无数微观的技术调节得以再生产与巩固,缺乏足够的理论工具和关注焦点。其分析尺度往往停留在个体或小群体与技术物的直接交互,难以跃升至对系统性、结构性不公的批判。

罗森伯格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因这些缺陷而否定后现象学,反而从中看到了将其政治理论化的

巨大潜能。首先，后现象学的反本质主义与关系存在论本身就拒斥了技术中立论，承认技术内在地具有调节(包括政治性调节)人类经验与世界关系的可能性。这为思考技术的政治效应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其次，其对情境性、具体性与实践导向的坚持，要求分析必须扎根于具体的技术实践与使用情境，这恰恰与微观政治分析关注日常实践、物质细节的需求高度契合。最后，其核心概念——如“调节”、“多元稳定性”、“技术透明度”——虽然未被充分政治化，但其理论内涵本身就指向了意义的开放性、权力的物质化以及感知的社会建构，为政治分析预留了丰富的概念接口。

因此，罗森伯格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要求后现象学必须解决后现象学在政治哲学维度的缺失；而后现象学内在的理论潜能又为其政治化改造提供了可能。这构成了罗森伯格探索后现象学技术政治理论的背景。

### 3. 如何探索：双重策略与批判性理论建构

#### 3.1. 借助外部理论赋予后现象学以规范性基础

罗森伯格清醒地认识到，后现象学自身缺乏成熟的政治规范性框架和系统的社会权力分析工具。因此，他借助芬伯格的批判建构主义、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等外部规范性理论，以赋予后现象学一个基本的政治规范性框架。

其一，与批判建构主义的联合。芬伯格的批判建构主义的核心在于揭示技术的未确定性与社会建构本质。技术并非沿着一条预定的、必然的轨迹自主发展，其具体形态是不同社会行动者(如工程师、管理者、用户、社会运动)在特定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基于各自利益、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斗争、协商与妥协的结果。在他看来，技术所带来的社会以及生态后果具有“偶然性”，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决定论追问的现代技术体系与生态环境必须二选一的难题是不切实际的[7]。技术既不是中立性的工具，也不是独立于人的天命。“技术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特定形式。技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给定的技术秩序都是一个朝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潜在的出发点，但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则要取决于塑造这种技术秩序的文化环境”[8]。芬伯格尤其关注技术如何可能被设计来固化现有的社会等级与统治关系，同时也积极探索通过技术民主化来干预技术设计，使其服务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与人类解放目标。

罗森伯格精准地抓住了芬伯格思想中关于技术作为政治斗争场域以及技术发展具有民主潜能的核心洞见。“批判建构主义与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许多富有成效的联系途径。在此，我想特别探讨其中一条：从稳定性维持或挑战等级制度的可能性角度来分析技术的多元稳定性”[9]。他将此与后现象学的“技术多元稳定性”概念进行深度嫁接。技术的不同“稳定性”(用途与意义)不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可能性清单，而是关联着不同的社会利益、权力格局与生活方式。对哪种稳定性成为社会技术网络中“主导稳定性”的争夺，实质上是政治斗争在物质层面的具体化。例如，公共长椅的“就坐”稳定性与“躺卧”稳定性之争，是无家可归者生存权、市民休闲权与城市管理者的秩序逻辑、商业地产利益之间斗争的微观体现。通过这一联合，罗森伯格为后现象学注入了历史性、斗争性的维度以及明确的规范性指向。技术的多元稳定性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主导稳定性的建立与替代稳定性的形成是各种社会利益权力博弈的产物，而这种权力博弈可以为社会公正或平等做出贡献。这使得对技术调节的分析，从静态的结构描述，转向了对动态的权力博弈与价值冲突的政治批判。

其二，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联合。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彻底打破了传统社会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客二元论，主张将人类与非人行动者(如技术物)置于平等的地位，共同视为塑造社会现实的能动者。ANT强调“转译”过程，即“行动者(个人或集体，人类或非人类)不断努力用自己的语言、问题、认同或兴趣把另外行动者的语言、问题、认同和兴趣翻译出来”[10]。关注行动者之间如何相互合作形成相对稳定的行动者网络。其“物质铭刻”概念至关重要：设计者将特定的行为模式、社会规范、权力

关系“写入”人工制品的物质形态之中，使其能够持久、稳定地规约后续使用者的行为。

罗森伯格借鉴 ANT 的分析方法来解剖敌意设计背后的权力网络。防睡长椅上的扶手间距、倾斜的座面、坚硬的材质，将“禁止躺卧、排斥无家可归者”的城市管理意图，固化在混凝土与钢铁之中。他运用 ANT 追溯网络的方法，来分析是哪些人类行动者(市政官员、设计师、警察、商户、普通市民)与非人行动者(城市规划法规、监控摄像头系统)结成了联盟，共同塑造并维持了长椅“仅容就坐”这一主导稳定性。然而，罗森伯格也指出了 ANT 的局限性：它擅长描述网络如何形成、稳定与行动，但对于网络内部存在的结构性权力不对称、系统性价值冲突以及为何某些行动者(如无家可归者及其支持组织)被系统地排除在网络之外或被迫服从，缺乏足够的分析工具与批判锋芒。后现象学的“多元稳定性”概念恰好能弥补这一点，它解释了为何同一技术物会成为不同网络(城市管理网络 vs.无家可归者生存网络)争夺的焦点，揭示了冲突的根源在于对技术物意义(稳定性)的根本性分歧。“行动者-网络理论非常适合解释长椅在被纳入一个网络的同时又被排斥于另一个网络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改变的。但是，多元稳定性的概念对于解释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特定的冲突，即长椅作为床的特殊物质准备和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偶然存在的对这种替代稳定性的需要，是非常有用的” [11]。通过这一联合，罗森伯格为后现象学装备了分析复杂社会技术网络、物质性权力运作以及非人行动者能动性的精细工具。

其三，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联合。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核心主张是：知识是情境化的，所有认知都源于特定的社会位置。处于社会边缘和受压迫地位的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工人阶级、无家可归者)，由于其独特的、被压迫的生存经验，以及对主流权力结构的“双重意识”(既了解其规则，又切身感受其排斥与伤害)，往往能够揭示那些被主导群体视角所遮蔽、扭曲或自然化的社会现实与权力关系。因此，追求更客观、更公正的知识与社会安排，必须从边缘群体的生活经验出发，并将其视角系统性地纳入研究与决策过程。

罗森伯格将这一核心洞见确立为其技术政治批判的伦理基石与认识论原则。他强调，要全面、深刻地理解一项技术的政治效应，特别是其不公正、排斥性的面向，必须优先倾听和关注那些被技术“主导稳定性”所压制、伤害或边缘化的群体的经验与诉求。无家可归者对防睡长椅的体验——不仅是身体的不适，更是尊严的受损与归属感的剥夺——是揭露该设计政治本质的关键。他们的“替代稳定性”主张(将长椅视为必要的栖身之所)，不仅是一种技术使用的可能性，更是对主导权力逻辑的抵抗与对更包容性城市权利的诉求。女性主义立场论确保了罗森伯格的批判不会沦为技术专家或特权市民视角的独白，而是始终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将边缘群体的福祉与正义作为批判的根本标尺。这为后现象学的政治分析注入了强烈的伦理关怀、正义指向与民主诉求。

通过这种批判性、有选择的“理论联合”，罗森伯格成功地为后现象学构建了一个稳固的“政治三角”：批判建构主义提供了历史与规范框架，ANT 提供了网络与物质分析工具，女性主义立场论提供了伦理与认识论基点。三者共同作用，使后现象学得以同时处理技术的价值负载性、权力网络的复杂性以及社会正义的紧迫性。

### 3.2. 在内部发展出带有批判性质的变更交叉检验法

罗森伯格对后现象学政治化理论路径探索的另一大发展就是将唐·伊德继承于现象学传统的、具有描述性研究性质“变更分析法”发展成具有政治批判性质的“变更交叉检验法”。变更交叉检验法是一种对相关技术物的主导稳定性与替代稳定性的政治性对比分析的理论方法。其最主要的理论目标是系统分析相关技术多元稳定性格局的政治意蕴。

罗森伯格继承了伊德的变更分析法的核心思路，但认为该方法存在扩展规范性研究的可能性。他与维贝克一同将伊德这种对变更分析法的描述性研究归于“消极”类的用途，即这种用途只是在理论上批

判技术拥有固定不变的本质的观点，而不涉及对具体技术案例所呈现的规范性维度探讨。同时，变更分析法还有“积极”类的用途，即通过对技术多元稳定性的变更分析，来考量除了主导稳定性之外还有那些替代稳定性，从而揭示具体技术物的不同可能性，促使人们反思主导稳定性所潜藏的各种价值内涵。

“在这类项目中，进行变更分析并非仅仅是为了证明一项技术实际上是多稳态的(如在消极用法中)，而是为了研究‘主导’稳定性之外的其他稳定性，并思考这些替代稳定性可能会让我们对主导稳定性有何认识” [12]。

这种变更分析法的积极用途，实际上为罗森伯格将描述性变更分析法发展成带有政治批判性质的变更交叉检验法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既然通过对一项技术物的描述性变更分析可以发现其所具有的不同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之中有着主导稳定性和替代稳定性的区别，并且理论上技术的不同稳定性在现实中表现为不同的技术使用方式，而技术使用方式可以与不同的社会网络相联结(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点)，不同的技术使用方式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必然会带来不同的政治效应，或是加强现有权力结构，或是削弱现有的权力结构(批判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通过将技术多元稳定性概念进行政治化改造，对一项技术多元稳定性的研究不仅仅有着伊德所言的现象学描述性研究意义，更有着罗森伯格所言的政治规范性研究意义。

由此，罗森伯格发展出了一种带有政治批判性质的变更交叉检验法。其理论不再是为了描述一项技术物的开放性意义，从而批判技术具有固定本质的抽象论点，而是为了通过有目的地对比一项技术物的主导稳定性与替代稳定性，揭示在技术多元稳定性的可能性空间之中，某些稳定性如何成为“主导”，而另一些稳定性如何被压迫或者被限制成为“替代”。变更交叉检验法摆脱了变更分析法的价值中立，带有明确的规范性立场与价值判断，从而将技术从一种无价值涉及的认识对象转变为政治斗争的核心领域，并且为反抗技术压迫提供了方法论上可行的操作方案。

## 4. 探索的结果：核心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体系

### 4.1. 核心视角：技术物作为动态的政治斗争场域

罗森伯格理论最根本的贡献，在于确立了一种看待技术物的全新政治视角。他超越了技术工具论(物是中性工具)和技术实体论(物是自主力量)，也不同于简单地将技术视为社会关系的“反映”。他提出，技术物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政治斗争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的社会力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围绕着“技术物应该是什么、应该用来做什么”(即其主导稳定性)进行着持续不断的争夺、协商与妥协。技术物的物质形态，正是这些斗争暂时性稳定化的结果，是权力关系的凝结与物化。因此，分析任何技术，都不能忽视其内在的政治性，即它总是处于特定的权力网络之中，并执行着特定的政治功能(无论是巩固还是挑战现有秩序)。

### 4.2. 三大核心命题

基于上述核心视角，罗森伯格提炼出三个相互支撑的核心命题，构成了其理论的分析骨架：其一，技术内在地调节权力关系。这是其理论的存在论基础。技术调节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由于技术总是以特定的方式塑造着人类感知世界、采取行动、与他人互动的可能性，它必然会对资源的分配、机会的获取、身份的建构以及社会关系的模式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敌意设计是此命题的典型例证：它通过物质设计调节(实为剥夺)了无家可归者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其二，技术多元稳定性是政治斗争的焦点。这是其理论最具创新性的部分。技术的政治性并非抽象存在，而是具体地体现在对其“多元稳定性”的定义权争夺上。社会总是试图将某些稳定性确立为“主导的”、“合法的”、“正常的”，而将其他稳定性贬斥为“替代的”、“越轨的”、“需要被纠正的”。这种“主导”与“替代”的

划分与斗争，是社会权力博弈在微观技术层面的直接体现。一把长椅是“座位”还是“床铺”的争议，本质上是关于城市空间权利、社会包容性与生存尊严的政治斗争。其三，技术习惯化导致政治遮蔽。这揭示了微观权力得以持久运作的心理-身体机制。当一种技术使用方式及其承载的权力关系因反复实践而沉淀为无意识的身体习惯，技术本身便在体验中“透明化”，其政治意图被遮蔽。对于特权群体，不公正的设计因其“透明”而不可见，从而免于批判；对于边缘群体，这种设计则持续地以“不透明”的障碍形式被痛苦地感知。这种感知的差异，正是权力不对称的体验性证明，也是权力结构得以自然化和巩固的关键。

这三个命题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技术具有政治调节的潜能，这种潜能现实中表现为对技术稳定性的定义权斗争，而特定的斗争结果(主导稳定性)通过习惯化过程被自然化，从而隐匿了其政治性，确保了权力结构的稳定。

### 4.3. 一套方法论：变更交叉检验法

如前所述，变更交叉检验法是罗森伯格政治理论化探索的方法论结晶。“我建议在做变更分析之后的下一步可以称为‘变更交叉检验’。这指的是对各种稳定性进行批判性的相互对比。通过将特定稳定性相互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它们的特性”[13]。它将上述理论框架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程序，其包含三个逻辑递进的步骤：

第一步：变更分析。此步骤旨在执行现象学“悬搁”，打破对技术物的惯常理解，开放性地列举其在具体情境中所有潜在的用途与意义，即“多元稳定性”。例如，对于公共长椅，不仅列出“座位”，还需识别其作为“床铺”、“置物台”或“社交点”的可能性。这为后续批判奠定基础，旨在揭示技术意义的开放性。

第二步：政治性交叉检验。这是该方法的批判核心。在识别出“主导稳定性”(如长椅的“就坐”)与“替代稳定性”(如“躺卧”)后，需从三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以追溯权力网络。其一，物质定制。分析物理设计(如扶手间距、材质)如何铭刻意图，鼓励主导稳定性并抑制替代稳定性。其二，网络与相互塑造。追溯塑造并维持此格局的行动者网络，包括人类(如设计师、市政管理者)与非行动者(如法规、话语)。其三，行为与习惯。分析当前格局如何通过“技术习惯化”被不同群体内化，导致“政治遮蔽”——使不公正的设计对特权使用者变得“透明”而不可见。

第三步：批判性综合与干预。基于交叉检验的诊断，明确技术物所执行的政治功能(如空间排斥)。进而，基于技术固有的多元稳定性，探寻在设计(倡导包容性设计)、政策(修改不公法规)、认知(打破政治遮蔽)与使用(创造性挪用)四个关键节点进行民主化干预与重塑的可能性，推动更公正稳定性的实现。

## 5. 评价

### 5.1. 主要学术贡献

其一，对后现象学技术政治理论的积极探索与拓展。2024年，作为后现象学开创者的伊德去世后，维贝克和罗森伯格二人联合写作了一篇文章《伊德：1931~2024》用以纪念与回顾后现象学的发展历程。在此文中，他们总结了伊德所提出的后现象学的核心贡献在于找到了一条从哲学层面深入描述人类与技术之间关系的理论，并指出后现象学未来发展的新路径在于“结合其他外部理论来推进后现象学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研究”[14]。罗森伯格对后现象学的技术政治理论的探索，正是对这一路径的积极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有两个部分，核心概念的创新以及方法论的创新。他将后现象学的描述性核心概念，如技术调节、技术多元稳定性和技术透明度进行了深刻的政治化阐释。技术调节被明确为权力关系的调节；技术多元稳定性被区分为主导稳定性与替代稳定性的斗争场域；技术习惯化则与“政治遮蔽”效应相关联，

揭示了权力得以隐匿和巩固的微观心理机制。这种改造使后现象学从一套描述“技术如何作用”的工具，转变为能够诊断“技术为何如此作用及其政治后果”的批判理论，进一步推进了后现象学的未来发展。

其二，对建构性技术哲学微观政治维度的丰富。罗森伯格的思想积极响应了菲利普·布瑞所倡导的“建构性技术哲学”的号召，即技术哲学应积极介入并设法改变技术的社会影响[15]。他的工作体现了从“反思”走向“建构”的实践取向。变更交叉检验法不仅旨在诊断技术不公，其第三步“干预可能性”明确指向了在设计、政策、认知与使用等多个节点进行民主化变革的具体路径。这使得他的理论超越了一般性的社会批判，成为一份旨在推动技术环境朝着更公正方向重塑的行动指南。该方法为非专家的公众、设计师、政策制定者等不同行动者提供了清晰的角色定位与分析工具。它教导公众如何解码身边技术的政治脚本，启发设计师在源头纳入边缘群体视角，也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创建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环境，从而在微观层面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民主参与。

其三，为技术民主化进程提供新的后现象学理论参照。在关于“技术如何更民主”的经典争论中(如芬伯格与温纳的理论)，罗森伯格引入了独特的后现象学视角，为技术民主化贡献了新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思路。基于技术多元稳定性命题，他强调任何技术安排(主导稳定性)都并非唯一或必然，而是特定权力网络暂时稳定的结果。这从存在论层面肯定了技术民主化是可能的——通过对稳定性斗争格局的干预，技术完全可以被重塑以服务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他将技术民主化的实践，从传统的参与式设计、技术评估等宏观制度环节，扩展至对日常技术使用习惯的反思、对不公正设计的创造性挪用、以及通过艺术与话语打破“政治遮蔽”等更为多元的微观实践。这为技术民主化运动提供了更丰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可行策略。

## 5.2. 理论局限

其一，规范性基础模糊及相对主义困境。由于后现象学自身缺乏内生性的规范伦理框架，罗森伯格的批判立场严重依赖外部理论的“嫁接”。他所联合的批判建构主义(关注分配正义与权力结构)、女性主义立场论(关注承认正义与边缘体验)等，各自有一套价值优先顺序。当这些价值在具体案例中冲突时，例如，在公共卫生间设置紫外线灯以防止吸毒，是应优先考虑公共安全，还是吸毒者的尊严？其理论缺乏一个元规范框架来进行裁决和排序，可能导致批判在复杂情境前陷入沉默或随意性。规范性基础的模糊，使得在面临艰难的价值取舍时(如效率与公平、安全与自由)，其理论难以提供明确的抉择依据，从而在最需要指导的复杂政治决策面前，其实践效力可能被削弱。而且由于其方法极度依赖具体情境分析，这固然是其优势，但也可能削弱批判的普遍性。公正与否的判断似乎完全依赖于对特定“技术-情境网络”的分析，这使得建立普遍的技术伦理原则变得困难，并可能滑向“在此情境不公，在彼情境或许合理”的相对主义困境。这种困境源于行动者网络的“对称性”原则与批判建构主义或女性主义立场论“价值立场”之间的认识论冲突，行动者网络要求在研究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如法规、设计物)置于平等地位，以价值中立的描述性方式追踪权力网络的构成与运作。而批判建构主义或女性主义立场论则坚持“批判性不对称”，主张必须优先分析技术背后的资本运作逻辑或采纳边缘群体的受压迫经验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其认识论都具有明确的规范性指向，旨在揭露和挑战不公正。这使得其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始终部分外在于其描述框架，难以统合而不矛盾。

其二，方法论在微观与宏观的技术政治结构分析衔接薄弱。

变更交叉检验法非常关注具体的技术人工物所呈现的权力关系，这是其在微观技术政治分析的关键切入点。但从宏观的政治结构来看，技术的权力关系承载体很有可能是一种“非具体的抽象存在”，比如一把长椅的设计，可能受到市政预算削减、全球钢铁价格波动、标准化工业生产模式等多重宏观力量的塑造。这些力量是资本循环、利润率追求、全球化分工的逻辑体现，而非某个设计师的明确意图。变

更交叉检验法能追溯到安排故意设计的具体政策以及供应商，但难以将低成本、标准化、易安装这些物性特征，与市政服务的资本化、公共产品供给的商品化等这些归属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内容深刻联系起来。并且，在批判故意设计的意识形态因素上，变更交叉检验法没有同宏观的意识形态批判相互联系。这一方法能揭示“维护市容”话语对无家可归者的排斥性，但难以充分分析这套话语本身是如何在更广阔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将贫困个人化、将公共空间私有化、将整洁等同于安全与发展中被系统性生产出并赋予常识性力量的。

## 6. 结语

罗伯特·罗森伯格通过“内外兼修”的双重策略——对外批判性地联合芬伯格、拉图尔和女性主义立场论，对内发展出“变更交叉检验法”，他系统性地构建了一套以“技术物作为政治斗争场域”为核心的微观技术政治理论框架。这套框架包含三大紧密相连的命题，并配备了一套可操作、具有建设性指向的批判方法论。

罗森伯格的工作，丰富了技术哲学的政治维度，将批判的锋芒精准地指向了塑造我们日常生活的微观物质环境。他告诉我们，政治不仅发生在议会和街头，也发生在公园的长椅、街头的摄像头和手机的算法里。理解并改变我们的技术世界，需要一种能够解码物化权力、倾听边缘声音、并积极探寻干预可能性的批判性实践智慧。尽管其理论在规范性融贯性与宏观衔接上仍有深化空间，但罗森伯格无疑为后现象学，探索出一条具有思想启发性以及现实关切的分析道路。这条道路提醒我们，在技术日益构成我们存在境遇的今天，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或许就是培养我们一种“技术的政治感”——一种能觉察技术的权力运作、能听见沉默之声、并能想象与实践更公正技术未来的批判性能力。

## 参考文献

- [1] 刘永谋, 谭泰成. 论当代技术哲学的政治转向[J]. 理论探索, 2021(6): 51-57+67.
- [2] 李三虎. 当代技术哲学具体化转向与技术政治哲学解释学[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8(1): 19-33.
- [3] Feenberg, A. (2009) Peter-Paul Verbeek: Review of What Things Do. *Human Studies*, 32, 225-228. <https://doi.org/10.1007/s10746-009-9115-3>
- [4] Bantwal Rao, M., Jongerden, J., Lemmens, P. and Ruivenkamp, G. (2015)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and Power: Post-Phenomenology, Critical Theory, and Autonomist Marxism.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8, 449-474. <https://doi.org/10.1007/s13347-015-0190-2>
- [5] Reijers, W. and Coeckelbergh, M. (2020) Praxis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Reijers, W. and Coeckelbergh, M., Eds., *Narrative and Technology Ethic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5-48.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60272-7\\_2](https://doi.org/10.1007/978-3-030-60272-7_2)
- [6] Lemmens, P. (2015) Love and Realism.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2, 305-310. <https://doi.org/10.1007/s10699-015-9471-6>
- [7] 王颖斌, 毛建儒. 芬伯格的技术新路及其批判性分析[J]. 科学与社会, 2019, 9(1): 102-114.
- [8] 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M]. 韩连庆, 曹观法,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65.
- [9] Rosenberger, R. (2020) “But, That’s Not Phenomenology!”: A Phenomenology of Discriminatory Technologies.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4, 83-113. <https://doi.org/10.5840/techné2020210117>
- [10] 陈凡, 朱春艳. 技术哲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426.
- [11] Rosenberger, R. (2017) *Callous Objects: Designs against the Homeles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5. <https://doi.org/10.5749/9781452958538>
- [12] Rosenberg, R. and Verbeek, P. (2015) Post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ssays on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In: *A Field Guide to Postphenomenology*, Lexington Books, 28.
- [13] Rosenberger, R. (2020) On Variational Cross-Examination: A Method for Postphenomenological Multistability. *AI & Society*, 38, 2229-2242. <https://doi.org/10.1007/s00146-020-01050-7>

- [14] Rosenberger, R. and Verbeek, P. (2024) DON IHDE: 1934-2024. *Journal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2**, 1-4.  
<https://doi.org/10.59490/jhtr.2024.2.7858>
- [15] 菲利普·布瑞, 王楠, 朱雅婷. 技术哲学: 从反思走向建构[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14, 6(2): 129-136.